

10.90
旬容文史资料



第三辑

纪念抗日战争胜利四十周年

85

旬容县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句容文史资料

(第三辑)

4616=117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江苏省句容县委员会 编
文 史 资 料 研 究 委 员 会

一九八五年九月

紀念抗日戰爭勝利四十年

李廣

兵燹初終救濟宣折自勝荒尸
未乾陳常平恤卹未由也濟身財
難弟山亦多志事成忠烈樊氏梁梓收
國難抗敵凱旋還世義遠望也孟辰所願

目 录

句容抗日时期的统战工作简况

- 句容县党史办黄安民提供资料 (1)
..... 句容县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室整理
- 巫恒通烈士传..... 王振琳 (15)
- 难忘的岁月..... **赵治和** 口述 (29)
..... 陈哲生 整理
- 坚贞不屈的伟大母亲..... 县妇联调查整理 (39)
- 巾帼儿女魏继瑾 机智勇敢送军情..... 董锁元 (44)
- 抓“活鬼子”过新年..... 李德安 (47)
- 樊玉琳同志吊唁王诚龙..... 仁 健人 (52)
- 我的一段回忆..... 夏元庆 (53)
- 我在张自忠将军麾下..... 孙万群 (59)
- 小学生明大义..... 夏正辉 (72)
- 茅山地区抗日战斗二三事..... 蔡竹友 徐齐邦 (76)
- 句容解放前后纪事..... 吴竟成 (83)
- 抗日民主政府兴办的冬学..... 夏正辉 (88)

句容抗日时期的统战工作简况

句容县位于江苏省西南部，北濒长江，东与丹徒、金坛毗邻，南与溧阳、溧水交界，西与江宁、南京市郊接壤。地理位置非常重要。一九三八年四、五月间，粟裕、陈毅、张鼎丞等先后率新四军先遣支队及第一、二支队，进入句容、镇江、丹阳、金坛、溧阳、溧水、高淳、江宁、武进、宜兴的广大地区，开展游击战争，形成了以茅山为中心的苏南抗日根据地。

句容地处茅山根据地的北端，京沪铁路（沪宁铁路）、京杭国道（宁杭公路）横贯其间，敌人的兵力集结在各个交通要点上，在徐州沦陷以后，敌人主力沿江西上，大举进攻武汉，因而江南地区敌人兵力不足，空隙甚多。这样，句容在战略上已成为抗日武装力量东进淞沪和北上江淮的枢纽，十分便于进行持久的敌后游击战争。

句容境内虽有茅山山脉和宁镇山脉蜿蜒，但既无崇山峻岭，又少茂林修竹，山地面积仅有百分之二十三左右，其余大多是丘陵和圩区，因此，新四军进入这一地区开展游击战争，困难是较多的，尤其与当时装备先进的敌人作斗争尚缺乏足够的作战经验。再者，由于句容原来就靠近国民党反动统治中心，虽然此时各级国民党地方政权都已后撤或无形解散，但是反动势力依然根深蒂固。另外，由于句容物产资源较丰富，日军占领这一地区后，就作为以战养战、以华制华的基地的一部分，因而在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都受到严

密控制。

面对这种种困难，新四军和地方党组织充分意识到，要开展游击战争，最基本条件是取得广大群众的拥护，包括来自社会各阶级、各阶层的支持。于是，在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的同时，积极开展统一战线工作，争取同盟者，作为党的“三大法宝”之一，被提到了开辟茅山根据地的首要地位，陈毅同志称之为这是“政治争夺”的统战工作，因而能够深入细致地而又艰巨地展开了。

—

一九三八年四月下旬，新四军先遣支队由皖南奉命东进，五月中旬进入句容，在行军中就开始进行了解当地民情、风俗、生产、消费等方面状况，特别着重调查因抗战所引起的新变化，尤其注意与当地中上层人士的联系。因为这些人较有经济实力，或者政治军事上的势力，在当地又有较深的社会基础，他们大多数倾向进步，有爱国心。

先遣支队路过句容樊古隍村，栗裕同志向当地的知名人士樊玉琳询问了有关敌情和社会的情况。当陈毅同志率新四军第一支队到来时，栗裕把樊的情况转告了陈毅。

樊玉琳是句容樊古隍村人，毕业于句容甲种师范讲习所，当过小学校长、教师，也当过国民党政府的区长、科长，一九二七年七月起赋闲在家，一九三五年又重新担任小学教师，直至日军占领句容。他目睹国民党军队的溃退、日军侵占后烧杀、淫掠，兵匪鱼肉百姓之惨状，深深感到有责任维护家乡的安宁，因此，与本村教师樊绪经等人商议，聚起二、三十人的自卫武装，后又联合其他两乡，组成了联合防匪自卫队，共有六十多人枪，对维持社会秩序起了一定的作用。

陈毅同志得知这些情况后，立即派人持亲笔信，邀请樊玉琳到茅山乾元观的驻地会晤，希望樊这位有地方声望的人带头支持新四军抗日。见面后二人彻夜促膝谈心，陈毅同志还风趣地用“山中宰相”陶弘景的掌故启发樊玉琳。新四军的智谋和勇气，官兵的谦恭和朴素，本已给樊玉琳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加之出自旧营垒，深知国民党政府的腐败，对比之下，樊玉琳当面向陈毅表示“国家兴亡，匹夫有责”。

陈毅同志率部队来到宝应以后，特请樊玉琳作为发起人之一，召集镇、句、丹、金四县各界人士代表会议，并在宝应筹备成立“镇句丹金抗敌自卫委员会”，担任总会主任。从此，樊玉琳正式走上了抗日救国的道路，在一九三九年夏天，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于次年二月提前转正，担任中共苏南特委委员。此后，他担任过新四军副团长、苏南一分区保安司令、专员兼县长等职。

樊玉琳的投身革命，对地方实力派、开明士绅和其他地方上层人士起到一定的感召作用，爱国知识分子巫恒通就是一个突出的例子。

巫恒通毕业于江苏省立第二师范学校（在无锡），曾任教师、小学校长、国民党句容县教育科督学、泰兴县教育局长等，是句容知识界的上层人士。抗战爆发以后，大江南北的抗日烽火，使巫恒通看到了国家和民族的希望，尤其是陈毅、粟裕在他家乡一带领导的敌后游击战争，更使他内心激动不已，大受鼓舞。终于，他克服了重重困难，于一九三八年底辗转回到了句容县。

回到家乡以后，他立即联络了卢肇熙、糜志立、倪道成等几个文人和他的胞兄巫全仁，组织起二十多人枪，于一九三九年三月二日正式成立“句容县民众抗敌自卫团”。由于

纪律严明、加上巫恒通本人在地方上的声望，这支队伍较受群众欢迎，在当地的_{影响}也较大，但苦于它的组织者多数缺乏部队军政和组织方面的领导经验。

正当他们一筹莫展的时候，新四军对他们进行了热情的扶持。一九三九年四月，陈毅同志邀约巫恒通会同樊玉琳前往溧阳东会村支队司令部，对如何发动群众团结抗日等问题作了具体的指示，还派出富有经验的军事干部曾昭璇等人，帮助巫恒通整顿和扩大队伍。从此，巫恒通这支队伍利用广泛的社会关系，在句容东北部地区积极开展武装斗争，各方面的工作都大有起色，整个东北地区出现了团结抗战的新局面。就在这年冬天，巫恒通由一个爱国主义者成为一名共产主义战士。他的这支部队也在第二年春天被改编为新四军第三团，在京畿地区、茅山周围的游击斗争中作出了贡献，多次粉碎敌伪军的扫荡，并直接参与了对国民党顽固派制造反共磨擦的有力反击。

“皖南事变”以后，巫恒通调任苏南第五行政区督察专员兼句容县长。一九四一年九月遭到敌伪袭击，突围时负重伤被俘，拒医绝食，壮烈殉国。陈毅同志称道他的气节与古贤文天祥、左懋弟相比，也“足以无愧”。

统战工作在句容开展以后，使一大批富有爱国热情的地方上层人士走上了抗日的道路，甚至为之而英勇捐躯；同时，也团结争取了许多本来态度暧昧的上层人士改变立场，他们有的积极投入抗战的阵营，有的保持中立。

句容东乡一带在抗战爆发后，经常有一支武装在活动。一九三八年新四军一支队进入茅山地区不久，陈毅同志就动员这支武装的首领张雍冲参加抗日活动。经过一番努力，七月中旬成立了句容抗日游击司令部，委任张雍冲为司令，收编

县、区各种游击武装，同时又成立了句容县抗敌自卫委员会分会，张为主任。八月十三日，新四军一支队二团攻打句容城，张雍冲率部担任京杭国道的阻援任务，对于取得这次战斗的胜利，起了一定的作用。同年年底，国民党三战区长官顾祝同通知他去皖南点验发饷，却被戴上“赤化”帽子而缴了这支队伍的械。

但是对这样一位地方上较有影响的人士，国民党顽固派仍在极力拉拢，当时任国民党江南行署秘书长的巫兰溪亲自出面，推荐张雍冲当国民党江宁县县长，后又驱使他参与磨擦行动，被新三团俘虏。释放后被国民党撤了职，他本人也从此一直持中立态度。

一九三八年七月下旬，在句容朱古陵，陈毅同志亲自主持召开了二百多人的会议，与会者多为地方士绅和教师。同年冬天，又在阴桥头开明士绅王诚龙、王诚凤家再次召开了士绅会议，应邀参加的除王氏弟兄外，还有朱巷村、清水坝、水南、窑上、王家边等村的二十名乡绅。会上，陈毅同志向大家宣传了团结抗战的重要意义，动员到会士绅有钱出钱、有粮出粮、有枪出枪、有人出人，支援抗战。王氏弟兄当即响应号召，表示愿在财力、物力上给予支持；会后，兄弟俩就用牲口向新四军和地方政府驮送了二、三百担粮食，二十多支步枪、驳壳枪，还有银元、钞票等。

王诚龙、王诚凤兄弟俩是句容南乡的地主，拥有田地近万亩，佃农五百户，每年收租稻上百万斤，还在县城里开了商店。他们之所以乐意帮助支援新四军，固然为了保护自己的生命财产的安全，但更重要的是为新四军真心实意的抗日精神和秋毫无犯的纪律所感动。

王诚龙名为延福乡敌伪的乡长，却常常利用这种合法身

份，通过住在县城里的三姐和其他关系，收集敌伪情报，及时提供给新四军。他作为地方上有名望的巨富，在应付国民党县长的同时，暗中向新四军反映国民党顽固派的情况，使新四军避免了一些损失。一九四〇年的一天，王诚龙得悉，国民党县政府企图假借请王必成（一支队二团团长）、段焕竞（新六团团长）吃饭，设下“鸿门宴”企图谋害这两位同志。王诚龙立即设法通知了段焕竞的爱人李珊，使敌人的阴谋没有得逞。

王氏兄弟在茅山、春城、南朱巷等地的租稻，基本都直接拨给了四县抗敌总会和以后的抗日民主政府。一九四四年春荒时节，他们又借出四、五百担稻谷，以此响应民主政府关于“生产自救、互助互济”的号召，使广大农民群众度过春荒难关，有效地稳定了人们的抗日信心。

由于王氏兄弟的经济地位和他们对抗战的贡献，他们在群众中的影响越来越大，对于进一步开展统战工作十分有利。但是，敌伪方面也更加注意王氏兄弟在地方上的声望。汪伪警卫师和日军驻扎阴桥头以后，对早已不干乡长的王诚龙进行了种种威胁利诱，企图让他再度出任汪伪乡长。王诚龙为此经受了严峻的考验。他也曾一度犹豫不定，如果为了保住生命和家产，当伪乡长确有好处，但是这毕竟不是长久之计，更有负于抗日民主政府和广大群众。在这关键时刻，民主政府派三区区长许行之及时向他陈明利害得失，并当场表示，只要不当伪乡长，一定尽力支持他与敌人斗争。于是，王诚龙坚决拒绝了敌人。敌人又以收割王的稻子来要挟，王诚龙宁愿稻子烂在田里也不愿被敌人割去，更不愿因此依附敌人。民主政权支持他的这一行动，明令凡替敌人收割者均按通敌论处，并果断地镇压了违令者。这件事在当时造成了很大的政治影响，对阻止敌人推行基层政权的伪化，

起到了良好的作用。

王诚龙本人的思想也从此发生了显著的变化，他不再为自己的生命财产而担忧，抗战的决心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坚强，直到敌伪军完全拆毁他家的全部房屋他也没有动摇。他被敌伪军伏击牺牲后，王诚凤仍然一如既往，毫不动摇，更加坚定的为新四军做了大量工作。

象王氏兄弟这样热心支持抗战的开明士绅还有不少。特别是一九四一年“皖南事变”以后，苏南新四军回到了茅山地区，进一步加强了地方与士绅的联系，解释了一些误会，消除了隔阂，在自上而下建立各级民主政权时，他们甚至争着做新四军的乡、保长。因此，在当时为了适应形势的新特点，地方党组织通过任命或推选的方式，吸收了相当数量的中、上层人士参与各级民主政权的工作，在整个苏南第五行政专区内，句容的统战工作最有起色。

二

抗战初期，句容的帮会是地方实力派之一，势力范围很广，成分也比较复杂，渗透到社会的各个阶层。句容的帮会以青帮、刀会为主，历史较久远，人数众多，具有一定的群众性。

句容地区随着国民党军队的败退，大批溃兵滞留在句容地区，他们勾结当地土匪武装，打家劫舍、绑票逼捐、鱼肉百姓，使句容地区处在极度混乱之中，多数老百姓为了自身的生命财产的安全，不得不加入了帮会，一时“拜老头子”成风，有的“老头子”竟有徒弟数千人。

由于同样的原因，一些地方实力派的知名人士为了保卫家乡和私人财产，也纷纷聚集地方子弟，收罗散兵游勇，打

着各种旗号，组织起自卫武装。他们的政治背景、军事实力以及对抗战所持的态度各不相同。但是，除了少数惯匪以外，一般都是应时而起的游杂武装。

为了维护句容地区广大农村社会秩序的安定，进而壮大抗日力量，新四军一进入茅山地区，就着手对各种游杂武装和帮会进行争取团结，共同抗日。

首先，成功地整顿、改编或扶持了一些地方自卫武装，如句容裔庄一带洪天寿的队伍，句容、溧阳边境的许维新部，宝埕、中心、白兔三乡的樊玉琳部，等等。其中势力较大的要数许维新部。

许维新是句容四区磨盘乡许家棚子人，旧军人出身。日军侵占茅山地区以后，他在大陆公司（林场）陶华阳的“长江抗日游击队”任第三大队大队长；陶部被茅麓公司打垮以后，他带领三百多人枪活动在与溧阳接壤的边区，他的学生和徒弟遍及全县，约两三千人。一九三八年四月二十三日，他带领白阳村群众，枪杀了前来抢劫奸淫的三个日军士兵，表现出民族的正义感和自尊心，很受百姓敬重。

陈毅同志认为，许维新虽然出身旧军人，但为人正直，威望较高，且有相当的军事指挥才能，是争取的对象。于是，陈毅同志亲自邀请许维新来支队司令部作客，因势利导地反复晓之以民族大义，同时还派人到许部做动员工作。虽然许维新对新四军还有一些错误看法，但他拥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赞成团结抗战，因此，他同意将他的部队作为新四军抗日的外围组织，定名为“新编第四军抗日义勇军第一大队”，许维新任大队长。为了使这支部队在战斗中经受锻炼，新四军每次打仗都让他们担负一些辅助任务，战斗胜利后又及时给予表扬和鼓励，不但不收他们的战利品，有时还送

去一些。在抗日斗争的洗礼中，他们逐渐感到新四军是可亲的，也是可信的。有一次，一支队举办干训班，陈毅特地邀请许维新参加。起先许维新很不以为然，说：“我上过国民党的军校，你们那一套军事技术我都懂，学不到什么新东西。”陈毅告诉他，训练班主要学政治，时间很短，还是去参加试试看。陈毅的认真耐心，使他觉得过意不去，只好勉强参加学习了。然而，一进干部训练班，他发现所学的是许多从来不曾听说过的新道理。学习结束时，他兴奋地对陈毅说：“上了几天训练班，胜读十年书。”其后，他不仅在感情上而且在认识上也有着新的见地。一九三八年八月，“抗日义勇军第一大队”正式接受新四军改编，成为一支队所属的独立营，许维新被任命为营长。紧接着，又送他赴皖南军部“抗大”学习，第二年春天结束学习回到部队后，在溧阳杨湾被吸收为中共党员，并相继担任新六团二营营长、句容四区区长、兵站站长、溧水警卫营长、溧水县县长等职。一九四一年八月六日他被叛徒暗害而牺牲。

一九三八年十月下旬广州、武汉相继失守，全国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一方面，敌人开始在占领区内进行“扫荡”战，在大江南北增调了三个师团以上的兵力，并构筑无数坚固的据点封锁线，企图以此来扼杀新四军。另一方面，敌人为了实施“以华制华”的阴谋，广泛地收买汉奸，组织维持会，建立伪政权。

面对这些新情况，新四军和地方党组织加紧了对地方各类游杂武装的整顿和收编工作，以便击破敌人的军事进攻和政治阴谋。

当时在句容东北部地区裔庄的洪天寿，他在一九三九年二月联合东昌、青山和茅庄三个乡的自卫武装，组成三乡自

卫中队。三月二日，中心乡的巫恒通也在家乡组织“句容县民众抗敌自卫团”。陈毅同志又指示洪天寿的三乡自卫中队和三埭村徐德润的自卫队前去联合，其他各地也纷纷响应。根据新四军一支队命令，这些武装于四月份组成了以巫、洪队伍为基础的“句容县东北区国民抗日自卫团”，下辖一个大队，巫为团长，洪为第一大队大队长。

从此，这支队伍在新四军的领导下，开展了各方面的工作。动员发动群众；建立基层抗日民主政权；设置不脱产的游击小组和情报网；配合主力打据点，破坏敌人交通，争取开明士绅工作，镇压民愤极大、怙恶不悛的汉奸等。整个句容东北地区出现了团结抗战的新局面，一些杂牌武装已经不能继续生存，有的自行瓦解，有的参加抗日队伍，使消极因素转化为积极因素，挫败了敌人以华制华的阴谋。到一九三九年底，这支队伍已扩充到五个大队三百余人枪，除原有的第一大队以外，其余四个大队都是地方游杂武装改编而成的。

一九四〇年一月，新四军二支队参谋长罗忠毅到句北领导工作，将这支队伍扩大改称“镇江国民抗敌自卫团”，同年三月，又经过整训后改编为新四军“新二支队新三团”巫恒通任团长，曾昭璜为参谋长（五月后为傅狂波），彭冲为政治处主任，洪天寿为一营营长。改编后不久，新三团就在江南指挥部直接领导下，活动在江宁、句容、溧水、当涂、镇江、丹阳等县的部分地区，多次粉碎敌伪军的疯狂扫荡，牵制了敌人的有生力量，为打退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逆流作出了努力。

在收编、整顿地方游杂武装的同时，对帮会作了大量的工作。一九四〇年八月，反革命大刀会制造了“横山事件”。

不久，国民党顽固派又策划土桥刀会二千余人搜捕新四军干部战士。溧句边区刀会头目蒋永赓、张锦山等又捕捉、拷打并企图杀害中心县委书记等人。句容各地，这类事件也时有发生，并且日趋频繁。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化敌为友，帮会问题就成为当时的一个突出问题。

一九四三年，中共苏皖区党委决定，由韦永义（丹北地区保安司令）、樊玉琳、洪天寿等同志分别负责对帮会的争取工作，并指示他们力图通过帮会组织的形式，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抗日力量。洪天寿同志过去曾拜过“青帮”大头目胡春潮为老头子，胡有几千徒弟，在镇句地区有一定的社会势力，因此，洪天寿在开展工作中成绩较为出色。

句容仑山一带有一伙土匪残余，一九四一年在头目葛金田、欧阳正林带领下投降了白兔的敌人，继续劫牛绑票、拦路抢劫，严重地影响了句容七区重建抗日政权的工作。一九四三年春，当时任县长的洪天寿派吴诚同志去白兔做葛金田等人的工作，以洪县长开山门“小老大”的身份促其改邪归正，并向他们明确表态：只要不受敌人利用，就决不追究旧过，立功者还将给以适当的工作。结果，欧阳正林率众杀死白兔日军士兵两名，拉着日军一匹战马投奔洪天寿。洪天寿表扬了他们的爱国行为，并立即任命欧阳正林为句容七区抗日独立大队大队长。与此同时，又解决了继续作恶的葛金田一伙，使仑山一带连年遭受的匪患得以平息。

为了进一步做好统战工作，苏皖区党委批准洪天寿以青帮头目身份招收徒弟，县政府还配备了专门干部，协助这项工作；另外，洪还在京镇铁路沿线和长江沿江一带，采取个别发展的办法，秘密地把许多伪军官兵、两面派和一般群众收为徒弟，据洪自己说，通过各种方式招收的徒弟总共有二

千多人。

洪天寿非常重视统一这些“弟兄”们的思想，尽可能地把帮会组织转化为有利于团结抗战的积极因素。一九四三年农历二月在小茅山举行的参拜青帮祖师“翁、钱、潘”的活动，就是这样的一次盛会。与会者约有四百多人，直到凌晨才结束活动。实际上，这是一次宣传动员、统一意志的活动，洪天寿对众人说：“先生当了新四军，不是叫学生个个都跟先生去当新四军，今天大家来参拜祖师爷，是为了尊敬先生而来的。当然，先生也要爱护学生，主要的一条就是打敌人，那么学生尊敬先生的主要一条，就是要做先生的耳目，与先生同心同德打敌人。”他还向大家提出了“十大帮规”。因而使一些“绿林好汉”做了不少有益于人民的工作，有些敌伪人员也因出于“同山兄弟”的关系而为新四军提供方便。如一九四二年五月中旬，谭震林、汪大铭、朱春范、樊绪经、洪天寿等十多位同志从高资去华中局学习时，就是通过洪天寿的换帖兄弟吴宗肃（士绅）、徐载禄（伪自卫团长）的关系，搞到了船只并安全地过江北上。洪天寿还以这种关系作掩护，顺利地使二百多名新四军干部送到江北。

三

“皖南事变”以后，为了进一步做好统战工作，各地先后成立了敌伪军工作委员会或敌工部、政工科等。句容敌工站由张仲良负责，镇江县敌工站由吴诚负责。

江南的伪军一是所谓正规部队“和平建国军”；一是杂牌军，多系地方上流氓、土匪和国民党残余组成的部队。他们各占一方，各有势力范围。此外，还有日军直接指挥的绥

靖队、汪伪特工大队等，有顽固派军队、伪化部队和各县的伪自卫总团等等。

随着江南敌后我军游击战争的深入开展，日军势力逐渐削弱，伪军也受到我军打击和分化瓦解。在这种情况下，日军更增强了对伪军的控制和压迫，因此伪军官兵的思想也逐步有所醒悟。一九四二年冬至一九四三年秋，下旬一个鸦片烟鬼贾方禄当上了当地据点伪自卫团团长，经常带着喽罗们四出敲诈，危害百姓，但他的田地房产和亲属都在游击区内。因此新四军县政府派王强到下旬据点向贾方禄提出：

“只准在指定范围内活动，并供应新四军粮草，传递情报，对敌人采取应付，不得危害人民群众。”贾方禄接受了这一条件。

一九四三年秋至一九四四年初冬，张志成接任下旬据点伪自卫团长，他是山东人，在当地没有居民关系。地方党组织决定派吴诚同志前去，以本地帮会的面目同他取得了联系。一九四四年敌伪进行大扫荡的时期，张志成的据点和他管辖的地区内都成了掩护新四军地下活动的安全区。

一九四四年初冬，四十七团参谋严浩率二营来镇句县活动，在下旬附近穿越公路时与张志成部相遇，张一枪未发，又率部退回据点。当晚，严参谋立即同镇句县政府研究，认为张志成此举可能要遭敌人怀疑，轻则调动，重则杀害，于是决定采取措施保护他，使张部五十多人枪全部回到人民的怀抱里。当地群众还烧掉了据点的碉堡，此后敌人就再没有在下甸设置据点。

再如原伪警卫师二营，一九四四年调驻句容阴桥头后不久，就与当地日军发生矛盾而且逐渐激化。镇句县三区区长许行之把这些情况向汪大铭作了汇报，并受命同樊玉琳、王